刘逢禄与清代今文经学

黄爱平

Jin Wen Jing Xue(a school of studying Confucian Classics written in Lishu)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s an emergency philosophy of the landlord class. In the middle of Qing, the rule of Qing government was on the wane, China was drawn into the world trends and at last faced with "a serious crisis that had never been met by our predecessors". On this special condition, Jin wen Jing Xue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ory about statecraft. In the course of resurgence of Jin Wen Jing Xue, Liu Feng Lu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今文经学，历来被称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在两千多年的儒学发展和中国社会进程中，今文经学的经典著作《春秋公羊传》，曾因其蕴含的微言大义一度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盛行一时，也因其中所在多有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不尽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被弃若敝屣。清代乾隆中后期，今文经学在沉潜千余年之后重新崛起，并且由学术而政治，在清代中叶出现的经世思潮以及其后志士仁人进行的变法改革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被称为清代今文经学健将的刘逢禄，在今文经学复兴的过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

刘逢禄，字申受，亦字申甫，号思误居士，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卒于道光九年(1829)，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刘逢禄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其祖父刘纶，乾隆年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卒谥文定，入祀贤良祠。其父刘召扬，秉性淡泊，勤奋好学，"自经史以及律吕、星算，外至释典、道藏、灵素之说，无所不窥"①，先后主讲湖南、陕西、山东各地书院，以课徒授业终老。刘逢禄的母亲庄氏，系礼部侍郎庄存与之女。这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一生"酷耽书籍"，颇通经史。刘逢禄深受家学熏陶，特别是受其母亲及外祖父的影响很深。在塾师课业之余，他经常跟随母亲学习经史大义及诗古文辞，对其外祖父庄存与深造有得的春秋公羊学尤感兴趣。乾隆五十一年(1786)，庄存与告归，询其学业，刘逢禄有问必答，"应对如响"，得到庄存与的称许，谓"此外孙必能传吾学"②，时刘逢禄年仅十一岁。自此而后，刘逢禄更加发奋努力，不数年，即遍阅十三经及周秦古籍，熟读董仲舒《春秋繁露》，并开始研治《春秋公羊传》，自言其"束发受经，善董生(仲舒)、何氏(休)之书，若合符节"③。嘉庆初年，其从舅庄述祖自山东奉母归家，刘逢禄又跟随治经，"问《尚书》今文、古文家法及二十八篇叙义，析疑赏奇，每发神解"④，并"从受夏时等例及六书古籀之学，尽得其传"⑤。刘逢禄后来曾回忆说："余年十有五，治《公羊春秋》条列之学，舅氏庄珍艺(述

祖)先生为言夏时之等，文约而旨无穷，与《春秋》相表里。出所著《说义》初本读之，观其论制礼作乐之原，三统内外之辨，治历明时之道，庶虞汁月之征，郊禘视学之典，王宫民居之制，务农重桑之事，土宜土均之法，忧旱备潦之谊，嫁子取妇之节，养老送死之要，王马国马之则，蒐苗狝狩之令，偃武措刑之德，尊卑上下之别，改火救疾之政，淳化昆虫之则，善善恶恶之旨，扶阳抑阴之义，慎始敬终之戒，富矣哉！洵太平之正经也。由是以知《春秋》改周之正，行夏之时，百世莫之能违者"⑥。家学的影响，自身的努力，使得刘逢禄学业益进，所造日深。就连曾向他传授学问的从舅庄述祖，也自叹不如，而称许"刘甥可师"，并从此放弃了研治春秋公羊学的打算，而寄希望于刘逢禄。

嘉庆十二年(1807)，刘逢禄考中举人，十九年(1814)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二年(1817)散馆授礼部主事，道光四年(1824)补仪制司主事。在官十余年间，刘逢禄立朝清正，持身谨严，勤于政事，深研经义，凡遇朝中大事及疑难问题，"辄援古事，据经义以决之，非徒簿书期会如胥史所职而已"⑦。公务之暇，仍手不释卷，著述不辍，道光九年(1829)卒，年五十四。

(二)

乾嘉时期，正是清代汉学日丽中天的时代。但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由盛转衰，各种社会思潮也在潜滋暗长。一些学者不再满足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据的纯学术研究，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力求通过各种途径，寻求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缓和各种社会矛盾，解决潜在社会危机的方案。今文经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并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的。

今文经学最初盛行于西汉，自古文经学兴起之后，二者即因经书文字、排列顺序，以及对经文说解、孔子评价等诸多问题的差异而形成学派之争。大体说来，古文经学偏重名物训诂，强调研究儒家经籍的篇章文字，今文经学则注重探索经书的"微言大义"，每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自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遵古文家法，兼采今文之说，遍注群经之后，今文经学遂一蹶不振，历千有余年而无人问津，几成绝学。乾隆中叶，庄存与首倡《春秋》学，为清代今文经学开山，但置身于汉学极盛之时，他尚未能摆脱汉学的影响，治经说经杂揉今古，不辨家法。刘逢禄继庄存与之后，进一步严立今文、古文界限，不遗余力地推崇今文，贬斥古文，为今文经学大张其军。他说："尝怪西京立十四博士，《易》则施、孟、梁丘氏，《书》则欧阳，大、小夏侯氏，《诗》则齐、鲁、韩氏，《礼》则大、小戴氏，《春秋》则公羊、颜、严氏，《谷梁》江氏，皆今文家学。而晚出之号古文者，十不与一。夫何家法区别之严若是，岂非今学之师承，远胜古学之凿空，非若《左氏》不传《春秋》，逸《书》、逸《礼》绝无师说，费氏《易》无章句，《毛诗》晚出，自言出自子夏，而《序》多空言，《传》罕大义，非亲见古序有师法之言与！"⑧在他看来，古文经学既无家法，又罕大义，远不如今文经学师承有自，大义彰明。对东汉古文经学诸儒，刘逢禄也深致不满，他指责郑玄"笺毛，箴何，注《易》、《书》，多舛驳不可从"⑨，郑众、贾逵之徒，更是"曲学阿世，扇国师之毒焰，鼓图谶之妖氛，几使羲轡重昏，昆仑绝纽"⑩。刘逢禄还把汉代以后今文经学衰亡的原因归结于以郑康成为首的东汉诸儒，他说："西汉专门传授之学，至东京而渐决藩篱。郑康成氏总群儒而通六艺，其学则于《礼》深，于《易》、《书》、《诗》、《春秋》浅，故注《礼》用今文，采韩说，及解《易》、《诗》、《书》、《春秋》，乃皆舍今学而从古文，聊以创异门户，存一家之说。其后郑学大行，于是《齐诗》汉代即亡，《鲁诗》亡于西晋，与《易》、《书》之今

文诸家同坠于地。《韩诗》、《公羊》虽存，自唐代已号绝学，而《韩诗》复亡于北宋。宁非东京诸儒阶之厉哉！”⑪

在排斥古文，推崇今文的同时，刘逢禄尤为褒扬《春秋》，崇奉《公羊》。这不仅因为今文典籍若“《易》施、孟、梁邱，《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师说今皆散佚，十亡二三”⑫，唯《春秋公羊传》及何休《解诂》一家硕果仅存，不绝若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刘逢禄看来，“《春秋》拨乱反正，始元终麟，由极变而之正也。其为致太平之正经，垂万世之法戒一也”⑬。他说：“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⑭。因此，对推阐《春秋》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何休，刘逢禄推崇备至，认为“二君者，游于圣门，游、夏之徒也”⑮。《春秋》“网罗众经，若数一二，辨白黑”，而“求其知类通达，显微阐幽，则公羊氏在先汉有董仲舒氏，后汉有何劭公氏”而已⑯。他说：“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⑰特别是“何氏生东汉之季，独能隐括两家（董仲舒、胡毋生），使就绳墨，于圣人微言奥旨，推阐至密”⑱，可谓“传经之功，时罕其匹”，因而，刘逢禄对董仲舒、何休之说，皆“宝持笃信，谓晋唐以来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门，不升其堂者也”⑲。

为了抬高《公羊传》的地位，刘逢禄还极力贬低《左传》。本来，《春秋》一书，系孔子据鲁国史《春秋》编成，辞简义奥，难于索解，后世学者因此而有“断烂朝报”之讥。赖有春秋三传，或发明其义例，或详载其史实，《春秋》之义与事乃得以明著于世。在春秋三传中，《公羊》、《谷梁》为今文，长于阐释《春秋》经文之义例；《左传》则为古文，详于叙述经文所书之事实，三者相辅相成，各有所长，不可偏废。但是，早在汉代，随着今文、古文经学两派之间的相互水火，春秋三传之争也愈演愈烈。东汉末年，何休笃守《公羊》家法，既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以发明其微言大义，同时又对《左传》、《谷梁》多所驳难。史载他“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⑳。而古文经师郑玄则针锋相对，分别作《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以驳何休之所难，以至何休有“入室操戈”之叹。刘逢禄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褒何休而贬郑玄，崇《公羊》而斥《左传》，认为何休“揆文本质，引权取经，使《春秋》贯于百王之道，粲然明白，岂左邱明氏杂采伯国之制所可同日语哉！”㉑不仅如此，在刘逢禄看来，《左传》乃史书，本不传《春秋》。他说：“左氏不预七十弟子之列，故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㉒。因此，“《左氏春秋》之名，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所据旧名如此，故西汉太常博士皆以《左氏》为不传《春秋》”㉓。刘逢禄认为，导致《左传》附会《春秋》的罪魁祸首是东汉末年的刘歆，他抨击刘歆三大罪状：其一，将《左氏春秋》之名改题为《春秋左氏传》，致使后世以讹传讹，造成《左传》传《春秋》的误解。其二，为《左传》“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㉔。刘逢禄举例说，刘歆于传中“附会《史记》鲁君子左邱明之语，多设为‘君子曰’、‘书曰’云云，类多鄙俗之谭，圣门五尺所勿道。致唐宋以来攻左氏者皆以为口实，则歆欲以为公羊之蠹贼，先为邱明之罪人矣。又臆造为不赴告故不书，不行礼故不书即位之属，使宋以后谓《春秋》第据赴告之文，别无褒贬。则不特邱明之罪人，尤为圣经之蠹贼矣”㉕。其三则是淆乱《春秋》大义。刘逢禄认为刘歆强引《左传》解经，“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淆乱隳坏《春秋》大义，“其罪大矣”㉖。对此，刘逢禄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以《春秋》归之《春秋》，《左氏》归之《左氏》”。他说：“事固有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者”，因而，欲将《左传》一书中凡“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

章断句之依附经文者”删而去之，“冀以存《左氏》之本真”㉗，并为此而撰《左氏申膏肓》、《左氏广膏肓》(又名《左氏春秋考证》)各一卷，“专辟刘歆之伪，以补任城《膏肓》所未备”㉘。平心而论，刘逢禄的看法不免偏激，特别是他指《左传》一书为刘歆窜乱妄作，更是武断之论。但是，在乾嘉年间汉学风靡一时，学术界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情势下，刘逢禄承庄存与之绪，不遗余力地为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今文经学摇旗呐喊，乃至陷于武断偏激，也是不难理解的。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或许是伴随着某种新思潮、新学派的崛起而常常出现的一种派生现象吧。

(三)

刘逢禄一生致力于今文经学的研究，于各经多有撰述。他青年时期跟随从舅庄述祖治经，尽传其《尚书》之学，遂撰《尚书今古文集解》，是正文字，旁征古义，于诸家聚讼之说，详载博辨，以“别黑白而定一尊，由训诂以推大义”㉙。又别为《书序述闻》一卷，申述师说，以明“舅氏庄先生一家之学”㉚。同时学者张惠言深研《周易》今文虞氏学，刘逢禄引为同调，不仅撰《易言补》，为张氏《易言》一书补全所缺震以下十四卦之说解，而且著成《易虞氏变动表》、《六爻发挥旁通表》、《卦象阴阳大义》等数种，“撮其旨要，约其义例”，进一步推阐东汉今文经学家虞翻《易》说大义，“以便缀学之士”㉛。时值汉学盛行，刘逢禄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认为“凡读书，必先审其音，正其字，辨其句读，然后可以求其义”㉜。因虑及唐宋以后，“去古日远，师心变更，而言韵学者与古判若河汉，《诗》三百篇及其他经传诸子之书，殆不可读”，乃承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等学者之余绪，撰《诗声衍》一书，自言“将以推诸君子未竟之志，析其义类，考其离合，集其大成”㉝。对《易》、《书》、《诗》、《礼》、《春秋》各经，刘逢禄也欲“仿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采辑旧本经籍所引，旁稽近代名儒深通经义小学者之言”，汇为《五经考异》，“以为童蒙养正之始基”㉞。后因忙于他务，未能成书。

在对各经的研究中，刘逢禄用力最久，最有心得，并且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他的春秋公羊学。刘逢禄精研《春秋》，尤深于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沉潜十余年，为之“寻其条贯，正其统纪”，撰《春秋公羊释例》三十篇。“更析其条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说之可兼者”㉟，著《春秋公羊解诂笺》一卷。“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答难》二卷。又博征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礼议决狱》二卷。又推原左氏、谷梁氏之失，为《申何难郑》二卷”㊱。他若推本《春秋》之义，先后撰《论语述何》、《中庸崇礼论》、《夏时经传笺》、《春秋赏罚格》等著述，“凡为《春秋》之书十有一种”㊲。刘逢禄去世后，遗稿经魏源整理，除《春秋公羊释例》单刻外，其余数种阐释《公羊》大义及申何难郑的主要著作一并合刻为《春秋公羊释例后录》，至于诗文杂著及各书序例笺释则辑为《刘礼部集》刊行。这些著作，既是刘逢禄一生学识和心血的结晶，也集中代表了他在清代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清代中叶，庄存与是首倡今文经学，并致力于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学者。但毕竟今文经学湮没已久，《春秋》微言大义隐晦难彰，因此，庄存与仅据元代学者赵汸的《春秋属辞》，“隐括其条，正列其义”㊳，著为《春秋正辞》。虽旨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寄托其“大一统”的理想，却未能直接汉代董仲舒、何休的统绪，探寻《春秋公羊传》的本义。继之而起的孔广森、凌曙等学者，则在庄存与开启的路径上前进了一步，注意到了发明《春秋》大义的汉代今文经学大师。孔广森撰《春秋公羊通义》，以补释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为职志，凌曙作《春秋繁露

注》，撰《公羊礼疏》，试图溯源董仲舒、何休，阐发《春秋》大义微言。但他们或别立新解，或无所发明，皆未能发现何休、董仲舒的总结，也就无从探寻《春秋》本义。至刘逢禄出，才直承何休、董仲舒之统绪，“由董生《春秋》以窥文艺家法，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㊴，从而使湮没千年的《春秋》大义重新彰显于世。

“大一统”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三科九旨”说，历来被今文学者视为《春秋》微言大义的核心。《春秋》开篇记载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认为，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相继崛起，纷争不已，天下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的乱世，但孔子删定《春秋》，仍遵用周朝纪年，以示正朔划一，这实际上寄寓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因此，《公羊传》据此发挥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㊵。又如鲁成公十五年（前576），《春秋》记载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鳝、邾娄人，会吴于锺离”。《公羊传》认为，此处之所以记载中原各国在会盟后特别与蛮夷之国吴国相会，蕴含着孔子内外有别，天下一统的深意，它说：“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秋。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㊶。诸如此类，所在多有。因此，在今文经学家看来，《春秋》几乎无一字不有褒贬，无一语不有深意。董仲舒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㊷。并著《春秋繁露》，对《春秋》褒贬义例作了多方面的发挥。何休承其统绪，进一步推阐为“三科九旨”说。所谓“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储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㊸。这也就是今文经学家推崇的“存三统”、“张三世”、“异内外”之说。但由于今文经学久湮不传，清代学者已不能完全明了个中深义，孔广森释《公羊春秋》，即反驳何休，认为“治《公羊》者，旧有新周、故宋之说。新周虽出此《传》，实非如注解。故宋《传》绝无文，唯《谷梁》有之，然意犹不相涉。是以晋儒王祖游讥何氏黜周王鲁，大体乖硋，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者也”㊹。因而他对“三科九旨”别立新解，谓“《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㊺。甚至对“大一统”之说，孔广森也提出异议，认为“天子、诸侯通称君。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元于其境内。而何劭公猥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例之失’矣”㊻。刘逢禄深明春秋公羊学，洞悉孔广森之失，指出“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谷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他明确宣称：“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奚微言之与有！”㊼因此，刘逢禄高标“三科九旨”之说，揭橥“大一统”之义。

以“三世”说为例。《公羊传》在《春秋》开篇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及绝笔哀公十四年三处都曾提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对此，董仲舒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㊽。何休《解诂》则称：“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

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何休还进一步发挥说：“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㊾刘逢禄在归纳《春秋》经传有关文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阐董、何之说，明确指出：“《春秋》缘礼义以致太平，用坤乾之义以述殷道，用夏时之等以观夏道等之不著，义将安放？故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若是者，有二义焉。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一义也。于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此又一义也。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㊿

又如“大一统”之说，自《公羊传》首揭其义之后，董仲舒继起，予以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51)。并极而言之，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52)何休也阐释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53)。刘逢禄虽然没有直接阐释“大一统”之说，但他却通过对《春秋公羊传》各例的阐发，表达了他希冀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消弭内忧外患，维护天下一统，王纲不坠局面的愿望。他说：“自王纲不振，小雅尽废，强大兼并，君臣放弑，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极于中国微灭，吴楚狎主，而三代之彝伦法制斁坏简弃无复存者。盖夏商之末失以强，而周之末失以弱，强则去之也骤，而汤、武之反正也亦易，弱则陵夷衰微，而天下之思治也亦难。厉、幽之亡，不生孔子，天将以《春秋》之制，统三王而正万世也，周之衰也，始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专封专讨，天子不能问也。继则自大夫出，而擅作威福，君若赘旒。下至陪臣效尤，而皂隶舆台启假威坐床之衅，外至四夷乘便，而文身左衽，张潜号争长之心。……夫子遂为之极其义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于是受命制作，取百二十国之宝书，断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上诛平王而下及于庶人，内诛鲁公而外及于吴楚，虽冒万世之罪而不敢避。曰：备矣”。(54)他如对“通三统”、“异内外”之说，以及《春秋公羊》经、传的诸多义例乃至文字褒贬，刘逢禄无不推本于董仲舒、何休，予以系统笺释阐发。可以说，在今文经学沉潜千余年之后，刘逢禄是第一个真正发现春秋公羊学之精义，直接找到并且大力推阐何休、董仲舒之总结的学者。当时学者就曾指出，刘逢禄“研精《公羊》，探源董生，发挥何氏，成《释例》三十篇。以微言大义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洞然推及属辞比事之道，又成《笺说》、《答难》、《决狱》等，凡十一书，自汉以来，未尝有也”(55)。后世学者也推崇说：“自《公羊》先师劭公而后，圣经贤传蔽锢二千年，徐彦、殷侑、陆佃家、铉翁、黄道周、王正中，咸相望数百载，虽略窥指趣，未能昭揭。迨所闻世，庄侍郎(存与)、孔检讨(广森)起而张之，至于先生(刘逢禄)，干城御侮，其道大光，使董、何之绪幽而复明，殆圣牖其衷，资瞽者以昭相哉！”(56)这些评价，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由于刘逢禄的发现和总结，才使得今文经学在清代中叶重新焕发生机，并为其最终走向现实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学术与现实政治相结合，是今文经学的显著特点。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⑰《公羊传》则直言："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并称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⑱至汉代，董仲舒进一步将经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视《春秋》为六经之首，以之作为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的理论基础，甚而据《春秋》论政，以《春秋》决狱。何休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虽然重在对公羊学理论上的总结，但也并未脱离东汉末年的现实政治。刘逢禄也继承了今文经学这一传统的特点，在大力推阐春秋公羊精义的同时，开始尝试援经议政，"据经决事"。

刘逢禄十分推崇汉代董仲舒的"讲明达用"之学，盛称"汉之吏治经术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⑲。在他看来，《春秋》一书不仅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而且与其后乃至今日的现实政治声息相通。他说："《春秋》之例，讥者讥其事，贬者贬其人，事非一人所成，咎加于主其事者，人所行不止一事，即一事以贬其人，功恶足以相除，若今准降级抵销及革职留任之类。本此以类推之，则讥若今交部察议、交部议处；贬若今交部严加议处及降级革职；重即诛绝，若今交刑部治罪；执若今拿问治罪"，⑳等等。因此，刘逢禄意欲"效法先汉诸儒"，讲求明经致用之学。他任职礼部多年，经常"据古礼以定今制，推经义以决疑难"。㉑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皇帝去世，有关丧礼典制，繁文缛节，难以明晰。刘逢禄"居署治大丧档案，以丧纪为礼之极，大丧为国家万事根本，尽瘁其事，成《庚辰大礼记注长编》十二卷，自始事以讫奉安山陵，典章备具。其后承修官书，遂全用其稿"。㉒道光四年(1824)，越南贡使来朝，为其国王母乞请人参，得到皇帝允准，所颁诏书有"外夷贡道"之语，使臣请将"外夷"改为"外藩"。礼部官员左右为难，独刘逢禄引经据典，谓《周官·职方》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国七千里，藩服九千里，是藩远而夷近。《说文》羌、狄、蛮、貊字皆从物旁，惟夷从大从弓。考东方大人之国，夷俗仁，仁者寿，有东方不死之国，故孔子欲居之。且乾隆间奉上谕，申敕四库馆不得改书籍中'夷'字作'彝'、'裔'。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我朝六合一家，尽去汉唐以来拘忌嫌疑之陋，使者无得以此为疑"。使臣遂"无词而退"。㉓他如据经义原情罪之轻重，决民事之纠纷，等等，时人多称其"有董相风"。㉔

但是，刘逢禄并未仅仅局限于简单地援经议政，借古说今，就事论事，而是直接董、何遗绪，发明春秋公羊学之精髓，表现出一种初步朦胧的经世变革思想。

作为春秋公羊学核心的"大一统"论与"三科九旨"说，实际上蕴含着一种注重经世变革，强调社会进化的思想。《公羊》学以传闻世为据乱世，所闻世为升平世，而所见世为太平世。在据乱世，以王室为中国，诸夏为外；在升平世，以诸夏为中国而外夷狄；在太平世，则"王者无外而夷狄进于爵"，天下遂得"大一统"。但《春秋》作于春秋末年，《公羊传》亦产生于战国末期，二者均为"乱世"而非"升平世"或"太平世"，因此说，《公羊》的"大一统"只是虚拟的一统，理想的一统，而非现实的一统，所谓"文然而实不然"也。然而，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才孕育出《春秋》的诸多微言大义，也才引发了春秋公羊学的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其中最有积极意义的，就是公羊学者着眼于现实，主张三代之治互有因革损益的社会进化思想。在今文经学者看来，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统，夏尚黑(人统)，商尚白(地统)，周尚赤(天统)，

而《春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就是要对三代制度进行因革损益，以实现新的"大一统"。所谓"《春秋》立百王之制，通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⑥刘逢禄也继承了春秋公羊学这种社会进化观，推衍"三统"之说，主张社会变革。他说："圣人迭治天下，必三统相循环者，何也？曰：昔夫子告颜渊问为邦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而后终之以乐，则韶舞。盖以王者必通三统，而治道乃无偏而不举之处。自后儒言之，则曰：法后王。自圣人言之，则曰：三王之道若循环，非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天下无久而不弊之道，穷则必变，变则必反其本，然后圣王之道与天地相终始。故正朔必三而改，而《春秋》因损文而用忠，文质必再而复，《春秋》因变文而从质，受命以奉天地，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而韶乐作焉。则始元终麟之道，举而措之万世无难矣"。⑥

刘逢禄还十分赞同春秋公羊学注重现实社会政治的特点，认为"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勿辨，其言弥微，其旨弥显，使人属辞比事，而辨惑崇德，斯善学矣。"⑥因此，面临嘉道年间清政权统治日渐衰败的困境，面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逼中国的危局，刘逢禄借助《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大声疾呼"《春秋》欲攘蛮荆，先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大夫，先正诸侯；欲正诸侯，先正天子京师"，希望从最高统治者做起，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和巩固清政权的统治。他反复强调："夫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可以尽复；先正乎内之治，而诸夏可以尽同"。⑥只要统治者自上而下，内振朝纲，就能够由近及远，外敌四夷。为了重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刘逢禄还尤为强调礼的作用，主张以礼为本，以刑辅之。他说："夫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故刑者，礼之律令；礼者，德之科条。礼防于未然，刑制于已然，而其本要在于德"。⑥董仲舒之所以推崇《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就是因为"礼者，刑之精华也，失乎礼即入乎刑，无中立之道，故刑者，礼之科条也。《春秋》之道，始于元，终于麟，绝于夏之冬，而犹系于周之春。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此亦太平之极轨也。"据此，刘逢禄认为，与其"持《春秋》以决秦汉之狱，不若明《春秋》以复三代之礼。"⑦因而，他对后世不察《春秋》之义，"或以子孙纵祖宗之囚，或以灾祥出众定之谳"的现象颇为不满，而寄希望于当今皇帝，希冀其"本尧舜之心以为心，酌周孔之教以立教，"使"谧刑之治，复见于今日。"⑦当然，刘逢禄借助春秋公羊学所阐发的经世变革思想，还仅仅是初步的，朦胧的。他尚未能更深刻地揭露当时社会日渐显露的各种弊病，也还未切身感受到变革的迫切性。但他却直接影响到其后继起的龚自珍、魏源，为他们在"世风日下"、"世变日亟"形势下，借助今文经学大倡经世变革，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龚自珍诗云："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⑦即可窥见刘逢禄的影响。

不过，刘逢禄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时，也未能避免今文经学本身的弊病，本来，今文经学在其形成初期，不过是朴素的原始儒学。自董仲舒主张"独尊儒术"，强调"天人合一"，把阴阳五行说引入儒学之后，今文经学便逐渐灾异化，谶纬化，何休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甚至有孔子作《春秋》，"待圣汉之王以为法"的说法。刘逢禄推阐董何之绪，也不免受其影响，认为"灾异者，圣人所以畏天命，重民命也。圣人之教民，先之以教而后诛随之；天之告人主，先之以灾异而后乱亡从之，其任教而不任刑一也。六经皆言灾异，《诗》、《礼》师失其传，伏生之于《书》，京房之于《易》，董仲舒、刘向之于《春秋》，大义略同，唯刘歆为异。其于天人相与之际，皆能精微眇以喻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则皆措之于事而可行，非概以恐惧修省之言惑当世也"。对董仲舒所言"《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

刘逢禄也十分赞同，认为“推此以应变，是谓求病而用药”。⑬他如反对郡县而主张封建，称许‘封建之于治，如宫室之有楹，舟之有维楫，柞枝之有叶也”；⑭主张社会进化而又不免陷于三统循环，认为“圣人迭治天下，必三统相循环”云云，也都不能不说是刘逢禄思想的局限。

清代中叶，在清朝统治逐渐显露出盛世之下的衰象，在中国日益被卷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乃至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下，今文经学异军突起，成为当时涌现的各种经世思潮中的一支生力军。而刘逢禄则是清代今文经学复兴过程中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上继庄存与，下启龚自珍、魏源，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严立今文、古文经学界限，极力推崇《春秋》，崇奉《公羊》，并且直接推本董仲舒、何休，比较正确地阐发了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得沉潜千年的今文经学一旦晦而复明，隐而复彰。可以说，刘逢禄对春秋公羊学的深入发掘和大力推阐，以及他“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的初步尝试，既为后来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改革家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也为他们借助今文经学倡言变法改制开启了先路。自此而后，今文经学进一步与现实政治相结合，最终由学术研究走上政治舞台，在清末的政治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① 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十，《先府君行述》。
②、⑤、㉙、㉛、㊲、61 《刘礼部集》卷末附《先府君行述》。
③、L、⑭、⑰、㊱、59 《刘礼部集》卷三，《春秋公羊释例序》。
④、㉚ 《刘礼部集》卷九，《尚书今古文集解序》。
⑥ 《刘礼部集》卷二，《夏时等列说》。
⑦、56、62 戴望《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载《续碑传集》卷七十二。
⑧、⑪ 《刘礼部集》卷九，《诗古微序》。
⑨ 《刘礼部集》卷九，《跋杜礼部所藏汉石经后》。
⑫、⑯、⑲、㉟ 《刘礼部集》卷三，《春秋公羊解诂笺序》。
⑬ 《刘礼部集》卷六，《书序述闻》。
⑮、65 《刘礼部集》卷三，《论语述何篇》。
⑱ 《刘礼部集》卷二，《释特笔例上》。
⑳ 《后汉书》卷七十九，《何休传》。
㉑ 《刘礼部集》卷五，《春秋公羊议礼叙》。
㉒、㉖ 刘逢禄《公羊释例后录》卷四，《左氏膏肓》。
㉓、㉕、㉘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卷四，《左氏春秋考证原叙》。
㉔、㉗ 《刘礼部集》卷三，《申左氏膏肓序》。
㉜、㉞ 《刘礼部集》卷九，《五经考异序》。
㉝ 《刘礼部集》卷七，《诗声衍序》。
㊳ 庄存与《春秋正辞》卷首，《叙目》。
㊴ 魏源《刘礼部集叙》，载《刘礼部集》卷首。
㊵ 《春秋公羊传》卷一。
㊶ 《春秋公羊传》卷十八。
㊷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㊸ 何休《春秋文谥例》，见《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疏引。
㊹ 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卷六，宣公十六年。
㊺ 《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卷末，《叙》。
㊻ 《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卷一，隐公元年。
㊼ 《刘礼部集》卷三，《春秋论下》。
㊽ 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篇》。
㊾、53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
㊿ 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一。
51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52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54、68 《刘礼部集》卷四，《释九旨例下》。
55、64 李兆洛《礼部刘君传》，载《续碑传集》卷七十三。
57 《孟子·滕文公下》。
58 《春秋公羊传》卷二十八。
60 《刘礼部集》卷五，《制刑》。
63 《清史列传》卷六十九，《刘逢禄》本传
66 《刘礼部集》卷四，《释三科例中》。
67 《刘礼部集》卷四，《释九旨例上》。
69、71 《刘礼部集》卷九，《尚德缓刑疏》。
70 《刘礼部集》卷四，《释特笔例中》。
72 《龚自珍全集》第9辑，《杂诗》。
73 《刘礼部集》卷四，《释灾异例》。
74 《刘礼部集》卷四，《十七诸侯终始表序》。